



学术名家文丛

纳西东巴文字概论

李静生 著

云南大学出版社
云南人民出版社



学术名家文丛

纳西东巴文字概论

李静生 著

云南大学出版社
云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纳西东巴文字概论 / 李静生著. — 昆明: 云南大学出版社, 2016

(云南文库·学术名家文丛)

ISBN 978 - 7 - 5482 - 2607 - 9

I. ①纳… II. ①李… III. ①东巴文—文字—概论
IV. ①H25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65627 号

出品人: 吴 云

统筹编辑: 柴 伟 陈 曦

责任编辑: 陈 曦

责任校对: 李俊峰

封面设计: 郑 治

书 名	纳西东巴文字概论
作 者	李静生 著
出 版	云南大学出版社 云南人民出版社
发 行	云南大学出版社 云南人民出版社
社 址	昆明市翠湖北路 2 号云南大学英华园内
邮 编	650091
网 址	www. ynup. com
E-mail	market@ ynup. com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20
字 数	307 千
版 次	2016 年 4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刷	昆明卓林包装印刷有限公司
书 号	ISBN 978 - 7 - 5482 - 2607 - 9
定 价	60.00 元

本书若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厂调换。(联系电话: 0871 - 67461883)

《云南文库》编委会

主任委员：李纪恒 赵 金 高 峰

副主任委员：钱恒义 张瑞才 陈建国 陈秋生

委 员：杨 毅 范建华 任 佳 李 维 张 勇

张昌山 王展飞 何耀华 贺圣达

《云南文库·学术名家文丛》编委会

主 任：赵 金

副主任：张瑞才 张云松 张昌山

委 员（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文光 王展飞 尤 中 朱惠荣 伍雄武 伏润民

任 佳 刘 稚 刘大伟 汤文治 李红专 杨 毅

杨先明 何 飞 何 明 何耀华 邹 颖 张文勋

张桥贵 陈一之 陈云东 武建国 范建华 林文勋

和少英 周 平 周永坤 胡正鹏 段炳昌 施本植

施惟达 贺圣达 崔运武 董云川 谢本书

主 编：张瑞才

副主编：张昌山

编 辑：马维聪 柴 伟 杨君凤



学术名家文丛

作者简介

李静生，男，1948年11月生于丽江古城，纳西族。1982年秋毕业于云南民族学院汉语言文学系，毕业后被分配到丽江市人民政府工作，曾任县文化局副局长。1984年6月调云南省社会科学院丽江东巴文化研究室工作，任办公室主任，协助研究室主任和万宝处理日常工作（当时和万宝在昆明任省委民族工作部副部长，尚未退休）；1991年研究室改为“研究所”，改任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副研究员；其后，研究所又改为“研究院”，任研究员。其间，深度参与了作为国家“九五”重点出版工程，之后又荣获第五届全国图书奖的《纳西东巴古籍译注全集》100卷的译注和校译工作。主持完成云南省社科“十五”课题“纳西族东巴教仪式资料汇编”，课题成果已出版并获奖。发表学术论文20余篇，其专著《纳西东巴文字概论》（云南民族出版社2009年版）荣获云南省第十四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曾应邀赴瑞士苏黎世大学及新加坡、柬埔寨等国家进行学术交流。2004年被聘为西南师范大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专业兼职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2005年被聘为云南民族大学民族文化学院兼职教授。



总 序

中共云南省委书记 李纪恒

“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一部承载责任与使命的好作品，必将是一部千古不朽的立言典范，也必将是一部历久弥新的传世教科书。千百年来特别是明代以来，许多贤人君子 and 名人大家在广袤的云岭大地耕耘、思考和写作，留下了闪光的足迹和丰厚的作品，足以飨及后进，启迪晚辈。在搜集、遴选和整理云南明代以来学术大家、学术名家著作的基础上，由云南宣传部门牵头推出了《云南文库》，这一丛书的面世诚为云南学术研究和出版界之盛事。

编纂《云南文库》是传承云南地域文明、提高云南文化自觉的有益尝试。“七彩云南”这片神奇的土地孕育了对中国乃至世界文明都有重要影响的古人类，造就了云南文化的丰厚积淀，从而构成了博大精深的云南文化艺术宝库。作为中华文化圈、印度文化圈和东南亚文化圈的交汇地，云南自古以来都不缺乏学贯中西的大师和博古通今的大家，从来都不缺乏魅力四射的光辉著作和壮美奇绝的文化遗存。其中，许多学术作品都凝聚了深邃的思想和超凡的智慧，体现了鲜明的地域特色和民族特色，彰显了有云南自身特点的知识谱系和学术传统。今

天，我们将历史长河中的明珠拾起，用心记载云南学术史上的灿烂篇章，正是为了守护云南优秀的地域文化，为了汲取进一步繁荣发展云南哲学社会科学的养分和动力，进而筑牢云南文化自信的根基。

编纂《云南文库》是树立云南文化品牌、增强云南文化影响力的重要举措。云南文化是中华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其悠久的历史、多彩的民族文化、独特的生态文化、包容的宗教文化，已经成为文化百花园中一枝流光溢彩、香飘四海的奇葩。千百年来，云南学者中英奇瑰伟之士以及众多寓居云南的外省学者念兹在兹，深植于云南沃土，扎根于传统文化，不懈探索、勤奋撰述，留下了一批经得住历史和实践检验的珍贵成果。特别是抗战时期，随着西南联合大学和相关研究机构的到来，昆明一时风云际会，云集了大批我国现代学术史上开宗立派的学术大师和著名专家，云南成为当时中国学术中心之一，诞生了大批学术经典。新中国成立后，云南学术研究取得很大进展，研究队伍空前壮大，学科建设卓有成效，学术成果日益丰硕，推出了一批享誉国内外的学术精品。近年来，《云南史料丛刊》《云南丛书》等一批历史文献和地方文献丛书相继刊印，云南文化的影响力和竞争力不断增强。今天，我们隆重推出《云南文库》，就是要为更多的人了解云南、熟悉云南、研究云南搭建一个平台和载体，为云南的经济社会发展、文化建设、文史学术研究等提供有益的历史借鉴，为在更广领域传播云南文化、打造云南品牌、增强云南软实力创造更好条件。

编纂《云南文库》是保障人民群众的基本文化权益的有效途径。文化建设的根本就是要用健康高雅的艺术、用智慧明辨的思想、用善良温厚的德行启迪人、引导人。编纂《云南文

库》一个重要目的是丰富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增进人民群众的幸福感。此次收入《云南文库》的著作，涉及哲学、历史、文学、语言、艺术、民族、宗教、政治、军事、外交等诸多方面，包含着丰富的自然、社会和人生哲理知识，体现了高度的人文关怀。阅读这些著作，有助于培育读者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心态，有助于引导人们去发现、享用、珍惜世界和人生之美，能使大众的精神世界得以滋养和美化、人格得以陶冶和熏陶、心灵得以安顿和抚慰、情感得以丰富和升华，从而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多层次、多方面、多样性的审美需求。

编纂《云南文库》是推动云南跨越发展的必然要求。云南早在1996年就提出了建设“民族文化大省”的目标，是全国最早提出建设民族文化大省的省份之一。2000年，我省正式确立了“建设绿色经济强省、民族文化大省和中国连接东南亚南亚的国际大通道”的三大目标，把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发展纳入了全省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范畴。2009年召开的中共云南省委八届八次全委会，作出了把云南建设成为“绿色经济强省、民族文化强省、中国面向西南开放的桥头堡”的重大决策，把云南文化建设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2011年11月，云南省第九次党代会进一步明确了科学发展、和谐发展、跨越发展的主题，要求更加自觉、更加主动地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当前，云南人民正豪情满怀地沿着建设民族文化强省的道路阔步前行，具有云南特色的文化模式已经也必将进一步焕发动人而耀眼的光芒。我们将以打造《云南文库》等一批社科品牌和文化精品为契机，继承优良传统，发挥优势，突出特色，以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宏大眼光，锐意进

取，积极开展学术研究，努力创造出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无愧于历史的优秀学术成果和文化产品，更好地弘扬以高远、开放、包容的高原情怀和坚定、担当、务实的大山品质为主要内容的云南精神。

《云南文库》最终得以发行，首先是众位先贤心血和智慧的结晶。在此，我们要对创造了云南学术精品并因此而为中华文化做出杰出贡献的学者们表示崇高的敬意！在《云南文库》的编纂过程中，相关编纂单位、出版单位和参加整理的学者，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兢兢业业地做好编校和出版工作，正是有了他们的辛勤劳动和精心工作，才有如今的翰墨流芳。在此，我要诚恳地道一声，大家辛苦了！《云南文库》从构想走向现实，离不开众多读者和社会各界人士的支持，我也一并向你们表示诚挚的谢意！同时，衷心希望同志们一如既往地云南文化建设献智献策，欢迎更多的同仁志士参与到云南文化建设的伟大事业中来！

谨为序。

叙 言

纳西族源于我国西北河湟谷地的古羌人，秦汉时往西南迁徙。约在唐武德年间迁徙至今云南丽江定居。^①纳西族古称“么些”，是一个历史悠久、文化深厚的民族。

东巴教是纳西族的原始宗教，这种宗教产生于纳西族先民原始社会阶段并流传至今。东巴教信仰万物有灵，几千年来它支配了纳西人的精神世界。东巴教的祭司称“本补”[py-| by ↓]、“打恒”[da-| hu ↓]、“许虽”[ɕy-| sue-|]等。依所做仪式不同而称谓各别。另外，一般又把纳西族东巴教祭司称为“东巴”[to-| ba ↓]。“东巴”为祭司神“东巴什罗”之简称。后世祭司自以为都是东巴什罗的弟子，民间一般也都称他们为“东巴”。东巴死后，要做超度东巴什罗仪式。有专家以为，“东巴什罗”乃源自藏族苯教，于唐朝初年传入纳西族地区。传说如果可信，那么“东巴”之称不会早过唐。从汉籍资料看，李京于元大德七年（1303年）写的《云南志略·诸夷风俗》与徐霞客于明崇祯十二年（1639年）写的《徐霞客游记·滇游日记》，都对纳西人的宗教活动有所记述。李京和徐霞客都是亲历丽江，亲眼所见、亲耳所闻的，可惜他们的笔下都未记及对纳西祭司的称谓。清乾隆八年（1743年），丽江知府管学宣命万咸燕撰修的乾隆《丽江府志略·风俗》则有如下记载：

^① 方国瑜：《纳西象形文字谱·绪论》，云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土人亲死，既入棺，夜用土巫名刀巴者，杀牛羊致祭。亲戚男女毕集，以醉为哀，次日送郊外火化。

从这条材料看，对纳西祭司“刀巴”（即今所译之“东巴”）之称，不会晚于乾隆八年。“东巴”之称流行以后，“本补”“打恒”“许虽”诸称便隐于文本中了。

东巴教传至近代，约有30来种宗教仪式，用于这种仪式上的书，约有1000种左右。1949年以前，纳西族地区农村山寨多有东巴，有的村子竟有五六个东巴。各村的东巴司掌村中一年的宗教事务。东巴也可以应邀到其他村寨活动。东巴教的仪式粗略可分为两大类：一为一年中在固定的时间里举行的仪式；二为有事才举行的仪式（即非固定时间里举行的仪式）。用一句纳西语概括，那就是“什居董居”[$\text{ʂər-} \mid \text{dzy-} \mid \text{du-} \mid \text{dzy-} \mid$]。前者是“董居”，如正月要祭天，二月要祭“署”之类；后者是“什居”，如人的生老病死，起房盖屋等所做的仪式。

东巴分两种，一种纳西语称“本补盘”[$\text{py-} \mid \text{by} \mid \text{p'ər} \mid$]，另一种称“本补纳”[$\text{py-} \mid \text{by} \mid \text{na} \mid$]，“盘”“纳”即“白”“黑”。“本补盘”只做祈福类仪式，如祭天、祭署、祭家神、祭五谷神、祭畜神、烧天香等仪式；“本补纳”则能做一切仪式。有些仪式一般东巴不敢做，如替凶死者超度的仪式。据丽江塔城乡署明村东巴和世先说，新中国成立前，整个依陇巴甸地区（过去东巴盛行之区），都只有两家东巴有能力做替凶死者超度灵魂的仪式，一家是和学智家，另一家是东巴崩达家。

东巴传承一般是父传子的形式，相传的代数越久，其东巴的威力便越大。东巴不是职业宗教祭司，平素是农民，照样干农活、放羊。过去东巴家男孩一般到五六岁就开始跟父亲学习东巴的知识，白天劳作，晚上坐在母房的火塘边，父亲就教儿子学习东巴知识。这个情景，在东巴经《除秽·加神的威灵》一书中有一段生动的描

述：“拉卡梭本若，有三驮东巴经，阿父坐在高处，儿子坐在下方，一册经书翻了一千遍，另一册经书翻了一百遍。聚集了千页的经书，阿父读了拿给儿子，儿子读了又拿给父亲，每本经书诵来首尾都不差错了。”从经书描述的情况看，学会一本经书也是不容易的，同时也说明了东巴是不可以任意增删经书内容的。这里强调多读、多练、不出差错。东巴们抄写东巴经和诵读东巴经不能有差错是有共识的，过去的东巴每写完一本书，往往要记上一段跋语，跋语中往往要强调这个问题。如大东巴和文质写的东巴经《延寿·祭署建署塔》一书的跋语中说：“……（这书是）我在27岁的这年写的，虽然手迹不好（写得不甚好看），但写来首尾不差错了，以后不能当作不值价的东西，不能不尊重它。”又如《祭署·抛刹道勾多面偶》一书跋语：“……（这书是）没若注写的，写来没有差错了，诵时也不要差错。”这种强调“不能差错”，在东巴经“跋语”中比比皆是。因此，那种以为东巴在诵读经书时可以任意填补其空隙的说法是不对的。据当年在丽江东巴文化研究所工作的老东巴们的讲述，他们幼时学东巴经书都要求背诵。每当有仪式做，老东巴都要带上自己的弟子做助手，让弟子在具体的仪式操作中学会各种仪式规程，学会制作各种祭木，使用各种法器，吟诵经书，跳各种东巴舞蹈。从五六岁开始，学到20岁左右，聪颖弟子一般能独掌仪式，成为东巴。

过去，一般东巴之家都藏有足够量的东巴经书。“东巴经”，纳西语称“东巴特厄”[to-|ba↓t'e-|u-|]，是“东巴的书”的意思。纳西语中无“经”的概念，所谓“东巴经”是学者们对“东巴的书”的称谓，可能以为既然是宗教的书就应该有神圣性，故有是说。东巴经用一种民间土法制作的纸装订而成，纸质坚韧厚重、耐磨，其原料主要是构皮。这种纸不一定由东巴自制。经书一般长26厘米，宽6厘米。每页一般分为上、中、下三行，每行若干格，分格的竖隔线有标点断句功能。写经书的笔，一般由山竹削制而

成，就地取材，简单易得。也有用蒿秆削制的笔，这种笔纳西语称“不吕”[pu↓ ly┐]，“不”[pu↓]即[pu┐]，蒿枝的意思，“吕”[ly┐]为量词，与汉语量词“杆”相当。“不吕”即汉语“一支笔”，或可谓“一杆笔”。因此“不吕”本义或许为“蒿秆”。若是这样，蒿秆制笔当早于竹笔。竹子制笔，不唯纳西族为然，据陈梦家先生说，早期汉族先民使用的笔，也是“但削竹木的枝而成的”^①。民国时期，在丽江宝山地区发现一种铜笔，铜笔所写的东巴经书文字笔画细而匀，但未及广传，东巴教已走向末路。书写东巴经所用的墨，也是就地取材。过去纳西人夜间照明一般用“松明子”，母房火塘边是一家人生活的中心，晚上烧上“松明子”，一家人围坐火塘边。“松明子”燃烧时，一股浓黑的松烟上蹿。为了防止烟子在屋里乱飞，人们便在“松明子”台的上方覆吊一陶盖，油烟可吸附盖上。久之，积下一层厚油烟。东巴制墨便取下油烟，再用一种名叫“季古都鲁”[tɕi┐ ky┐ ty┐ ly↓]的植物的根所制的药水调和油烟，便成了写经书的墨。现在看来，这种“药水”有两种功能，一是防虫蛀，二是使松烟墨增添光泽。

东巴经文的文字符号与语言单位的对应情况依地区不同而有差异，就丽江东巴经而言，大东、鸣音片区的东巴经记词字符较省（即用字较少），鲁甸、塔城片区的东巴经记词较详（即用字较多）。但总的来看，象形文记词的东巴经，几乎都是省略式的。这就是东巴经不能离开东巴们识读的本质原因。没有东巴的识读，一般人即使学会了所有东巴字，也无法读东巴经。因为一般人并不知道字与字之间究竟省去了些什么词。但东巴们是知道的，因为他们主要是靠背诵。犹如汉人的蒙童背古诗：“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这诗已经背得很熟，因此只要你写出“白日依山尽”，这首绝句的下面三句是什么已了然于心。但假如把“白日依山尽”拿给一个从

^① 陈梦家：《中国文字学》，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30页。

未读过这首诗的人，对这个人来说诗的下面三句实在是一个谜。

人们所收藏的东巴经约计3万册，但就其种类而言，可能不超过1000种。《纳西东巴古籍译注全集》共收897种书。

通常所说的东巴文，实际上包括两种性质不同文字体系。一种纳西语称为“森究鲁究”[sər-| tɕə ɿlɿ-| tɕə]。“森”是“木”的意思，“鲁”是“石”的意思，“究”是“痕迹”，“森究鲁究”意即木石上的痕迹，引申为“文字”。另一种称“哥巴特厄”[gə↓ ba ↓t'e-| w-|]，“哥巴”即“弟子”之意，“特厄”即“文字”，“哥巴特厄”即是“弟子的文字”，相传为东巴教祖师东巴什罗的360个弟子所创。在学术上，前者称为“图画象形文字”“纳西象形文字”“东巴文”等；后者称“哥巴文”“标音文字”“音节文字”“音字”等。关于这两种文字产生孰先孰后的问题学术上颇有争议。美国学者洛克以为“哥巴文”先于“象形文”，而我国学者一般都认为“象形文”早于“哥巴文”。现在收藏的东巴经中记录文词有三种情况，一是全用象形文所记写的写本；二是主要用象形文，偶尔掺杂有哥巴文的写本；三是纯粹用哥巴文所记写的写本。但现藏东巴经主要是前两种情况，第三种是极为少见的。象形文写本是省略语词写本，哥巴文写本是全记语词写本。哥巴文写本之不发达，除了这种字的晚出和局部地区才有之外，与字符本身的符号性、抽象性、多声调、多异体等问题有关。这两种文字，实际上是东巴们所创、东巴们所用的文字。因此，不论是“森究鲁究”，还是“哥巴特厄”都应叫“东巴文”，然而今天在东巴文研究领域，“东巴文”已成了“森究鲁究”的专名。

关于东巴文产生的年代，我国前辈学者方国瑜、李霖灿都曾进行过研究，但由于找不到直接证据，因此，没有一个确切可信的说法，应该说这个问题是至今尚待解决的问题。

东巴文究竟有几个字符，这又是东巴文字研究领域的一个问题。从目前流行的两本字典收字情况看，方国瑜《纳西象形文字

谱》编列 1340 号字，李霖灿《么些象形文字字典》编列 2120 号字。但两书所列字号，并不等于实际的字数。因为这两本书都存在着重收字和不应该作为字符处理而收编入号的情况。

东巴文字主要用于东巴教祭司东巴书写经书，但掌握这种文字的人偶尔也将之应用于日常的记事中，如记账、记契约文书、书信等等。这种记事文件，其记语词均为全记式，没有省略式。

纳西东巴文被学术上所注意，发轫于 19 世纪中叶。据杨福泉先生译介，法国传教士德古丁斯是第一个把纳西东巴古籍文字介绍到西方的人。他于 1867 年将一本有 11 页的东巴经从云南寄回巴黎，这本东巴经的名字叫《高勒趣赎魂》。1885 年拉卡珀尔（欧洲人）发表了文章《西藏境内及周围的文字起源》，1913 年法国人巴克出版了专著《么些研究》。巴克在书中介绍了他从 1907 年到 1909 年两次到纳西族地区调查所得的 370 多个东巴象形文字，并对纳西族的语言和词汇、语法做了初步研究。美籍奥地利人洛克于 1922 年至 1949 年长达 27 年的时间里，在纳西人居住的地区收集了大量的东巴经和其他东巴文物，并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①

20 世纪 30 年代初期，我国学者注意到了外国学者对纳西东巴文资料的收集和研究，并有方国瑜、李霖灿、傅懋勳等学者到纳西族地区，做了更为深入的资料收集和研究工作。1935 年，方国瑜写成《么些文字汇》的稿子。1944 年李霖灿完成了《么些象形文字字典》的编写工作，并由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在四川李庄石印出版。次年他又完成了《么些标音文字字典》的编写和出版工作。1948 年傅懋勳写成《丽江么些象形文“古事记”研究》并在武昌出版。通过上述学者的研究，到 20 世纪 40 年代中后期，东巴文的特殊价值被更多国内著名学者所知，并引起了他们的高度重视。

1949 年，李霖灿去了台湾。之后，他利用 20 世纪 40 年代收集

^① 白庚胜、杨福泉等编译：《国际东巴文化研究集粹》，云南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1-3 页。

记录的资料，继续进行这方面的研究工作，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1949年以后，由于历史的原因，东巴教很快受到了这样、那样的批判和打击。纳西人几千年传承下来的这种原始宗教文化，一时成了“封建迷信”和“牛鬼蛇神”，其宗教祭司东巴也遭到了不同程度的打击。一时间，丽江的村寨里，东巴教活动已销声匿迹，同时学术领域的研究也已鸦雀无声了。

20世纪60年代初期，时任丽江县委书记的徐振康（他受过良好的大学教育），不忍心看着祖国的这份文化瑰宝就这样消失掉，便让县委宣传部组织人力，聘请东巴，拨出专款去搜集、整理、翻译东巴经。当时从民间收集到不少东巴经，翻译并石印了22种。但好景不长，接踵而来的“四清”运动和“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止了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业。徐振康也因此受到批判，几乎丧生。

“文革”以后，万幸的是当年收藏在丽江市图书馆的5000千余册东巴经还安然无恙。而此时，1949年以前就学有所成的一些东巴老人还活着，但他们的年龄也已是六七十岁。一是书，二是人，这是抢救东巴文化的两个基本条件。纳西族有识之士和万宝、方国瑜等抓住了历史的契机，组建了“东巴文化研究室”（后改为所、院），该研究室经过20余年的不懈努力，翻译、整理出版了《纳西东巴古籍译注全集》。这部书的出版，标志着抢救纳西族几千年传承下来的东巴文化的行动取得了重大成果。从研究东巴文的意义上讲，它已较为完整地给学术界提供了这种文字记录纳西语的古典文本，从而使对东巴文字的全面深入的研究成为可能。因为此前这方面的可用资料仅仅是两三部字典和20余种经书译本而已。

历史发展到21世纪，东巴文这种原始文字作为记录语言的功用已逐渐淡出，而它所独有的认知价值和审美价值则日益凸显。东巴文、东巴经被外人所看重，甚至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记忆遗产，也是基于这种价值的存在。

东巴文对人类文明起源的研究有特殊的价值和意义，这一点已